

# 范式之争：华文文学研究“同心圆”范式与华语语系范式的差异与前景

## Paradigm Dispute: Differences and Prospects Between the “Concentric Circle” Paradigm and the Sinophone Paradigm i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Studies

岑园园，广州理工学院

### 摘要

近年来，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代表的研究者提出“华语语系文学”理论，试图重构华文文学研究概念与范式，学界对此已展开探索，指出中国大陆作为汉语文学创作与传播的核心主体，其人口规模、作品数量与质量均构成华文文学不可忽视的基础，华语语系范式存在先天结构性缺陷。过去广泛流行的华文文学研究“同心圆”范式虽面临中心化争议，但其形成具有复杂历史与现实成因。在当代中国国力提升、新大众文艺流行的语境下，这一范式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海外学者以华语语系范式直接对抗“同心圆”范式的学理可靠性有待商榷。通过体察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流变，辨析“同心圆”范式与华语语系范式的核心差异，可以推测华文文学研究未来的合理走向。

### Abstract

Recently, scholars—most notably Shih Shu-mei and David Der-wei Wang—have advanced the theory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endeavor seeking to reconstruct the concepts and paradigms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Studi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since engaged in critical inquiry regarding this theory, pointing out that mainland China, as the central entity for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constitutes an indispensable foundation for the field by virtue of its demographic scale as well as the sheer volume and quality of its literary output; consequently, the Sinophone paradigm is argued to suffer from inherent structural flaws. Although the once widely adopted "Concentric Circles" Paradigm i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Studies has faced criticism for its perceived centrism, its emergence was shaped by complex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factors. Against the context of the rising national strength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prevalence of new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this paradigm still retains strong vitality. The theoretical reliability of overseas scholars'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the "concentric circle" paradigm by adopting the Sinophone paradigm remains questionable. By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for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and analyzing the co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centric circle" paradigm and the Sinophone paradigm, we can infer the reasonabl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Studies.

**关键词：**华文文学；台港澳文学；“同心圆”结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范式

**Keyword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Literature; "Concentric Circle" Structure; Sinophone; Literary Study Paradigm

## 一、前言

近年来，“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被史书美、王德威及一众海外汉学家们用来重构华文文学研究概念。具有所谓华语语系研究奠基者身份的史书美在《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里宣称，“华语语系”是指“在中国之外以及处于中国及中国性边缘的文化生产网络，数百年来改变并将中国大陆的文化在地化”（史书美，2013：17），意即这一以华语为名的语系概念在范围上并不包括中国。这导致“华语语系研究”从被建构之初就存在必然缺陷，因为中国大陆十亿级的汉语使用人口数量远超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华人社区，其文学作品的产出数量、质量更非后者所能比拟。吴景明、李忠阳认为，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之所以在概念包涉范围上将中国大陆主流文学实践（汉族群体文学实践）排斥在外，是为了抵抗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中国（大陆）本位主义、‘中国性’的文化霸权，打破以中国/汉族为中心的族裔/文化想象”，这些海外学者挑战了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主导的民族国家范式。（吴景明、李忠阳，2019：86-91）民族国家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遭到质疑和解构，这一现状的形成是由复杂多元的原因导致。史书美等台湾地区 and 海外学者试图以华语语系文学、华语语系研究来建构“华语语系范式”，从而与中国大陆的民族国家范式对抗，这样的做法在学理上是否可靠，还需要从华文文学研究范式在不同社会氛围中的形成与流变来谈。

## 二、寻求“异”中之“同”的“同心圆”范式

令史书美等人感到敏感并作出批判的华文文学研究的民族国家范式，在古代中国并不成为问题。在数千年不断的冲突、破坏、兼并，尤其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的全球扩张中，西方世界的早期文明在融合和变迁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从上古至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其文明的内核得以存续。近代以前，中国国民在农业社会形成了安土重迁的心态，人员的海外流动相当有限。在文化层面，对表述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夷夏模式”有着长期认同。《尚书·禹贡》按照距离国都的远近产生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之分，强调了文化的向心性和凝聚力。而《春秋》与《尚书·禹贡》不同，其中提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按照对中原正统文化的接受程度来区分夷夏。在中国传统视野中，族群之间存在差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这种族群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文化的融通来弥补，能够接受以“仁”为中心的礼乐教化的外邦外族也具有与中原正统文化对话的基础和资格，还可以纳入“夏”的范围。“夷夏模式”建构了一个以中原文化正统为圆心、周边各族群按照与中原文化关系处于不同外部地位的同心圆结构，形成了华夏文化共同体，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

华文文学研究对中心和边缘的认识可以与“夷夏模式”相呼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以意识形态为首要标准，为港澳台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留下的空间不大。中国大陆文学居于圆心，具有正统、主流地位，港澳台乃至海外华文文学处于边缘地带，这也是当时局势和氛围下的必然产物。1997年，陈辽在《论香港回归后中国和世界华文文学格局的新变》一文中说：“中国是华文文学创作的大国，是华文文学同心圆的圆心。无论是在创作数量和创作质量上，就整体而言，都高于其它地区和国家的华文文学。”（陈辽，1997：103-105）他把华文文学看作一个同心圆，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颇具新意的观点。不过陈辽按照意识形态将华文文学简单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以社会主义的华文文学为圆心，以资本主义的华文文学为边缘，这样的二分法比较机械，至于文中认为回归以后的香港文学“将逐渐汇入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预测还有待时间验证。陈辽之后，考察中国大陆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时以“同心圆”立论成为常态。樊洛平认为华文文学已经形成了几大板块，如中国的大陆和台港澳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日本和大洋洲华文文学以及欧美华文文学。“大陆文学无疑是最大的板块，是华文文学同心圆的圆心。”（樊洛平，1998：117-121）她亦持圆心说，从文学创作的体量和声量上肯定了大陆文学的地位，也强调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总体把握。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华文文学研究方面颇具分量的刘登翰和余光中两位学者分别对华文文学的“同心圆”结构作出表述。2001年，刘登翰在《文学评论》发表《分流与整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认为对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汉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并提出以中华文化为圆心、以大陆和台港澳文学为内圈、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为外圈的同心圆结构。（刘登翰，2001：42-47）余光中对华文文学“同心圆”结构表述更为全面。2002年4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第五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余光

中作了题为“离心与向心：众圆同心”的讲演，明确提出中国大陆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的“众圆同心”结构。他认为按照距离中心的远近，华文写作从“五四”新文学以来逐渐形成了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中国大陆；第二世界是台湾、香港；东南亚是第三世界。”（曹安娜，2002：72-77）这三个世界的划分并非绝对，马来西亚华文作家进军台湾，是第三世界向第二世界的突破，许地山等从中国大陆前往东南亚的“南来作家”则相当于第一世界参与第三世界。这三个世界的关系并非平行或者隔离的，而是不断动态融合的。

在20世纪末以来的华文文学研究中，“同心圆”范式影响巨大。尽管不同学者对圆心的判断有所差异，比如陈辽、樊洛平、余光中等从文学创作入手，认为华文文学的圆心是中国大陆文学，而刘登翰从文化语境出发，认为圆心是中华文化。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同心圆”结构存在一些共同认识：第一，指出了中华文化在华文文学创作的核心地位与宝贵价值。尽管世界华文文学受到所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同心圆”范式更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文学创作中“同”的一面，关注作家和作品的中国文化根性。刘登翰表示：“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是分流的前提，也是整合的基础。”（刘登翰，2001：42-47）至于台港澳文学等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分流，乃是奠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同”中之“异”。第二，肯定了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的创作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学界依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创作方针，创作出大量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有一些作品以其特殊的题材选择、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和突出的艺术水准而成为“红色经典”，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以中国大陆文学为同心圆的圆心，相当于承认了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地位和价值。第三，“同心圆”范式下的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所具有的独立性并非文学研究的重心。众多学者都注意到华文文学所面对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交汇、冲突、融摄和变异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已彻底分流。“同心圆”范式强调去寻求居于基本、基础地位的“异”中之“同”，认为“‘异’是在‘同’的文化基础上呈露的不同形态和进程，而不是另一种新质的文化或文学。”（刘登翰，2001：42-47）

### 三、“同心圆”范式的局限与华语语系范式的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夷夏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五千多年的漫长时期里长期延续下来，关键在于中原文化在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中原文化优势强化了炎黄子孙的心理归属，也引导了周边广大地区的文化认同，形成遍及东亚、东南亚的儒家文化圈。这种远超其他文明成就的先进性是古代时期华夏文化共同体的保证，也是“用夏变夷”、使同心圆结构不断外扩的动力。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遭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战火纷飞之下种种丧权辱国、家破人亡的惨痛往事破坏了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这导致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同心圆”范式在用于华文文学研究时不可避免地直面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如何看待中华文明在近现代时期上百年里的某种失灵状态。曾经强盛的封建政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近代以来的民族史成为一部屈辱史，中华文明应该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调整自身的定位，如何面对已经发展到高度繁荣状态的西方文明，如何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积淀、不同质态下的异种文化互相沟通，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完成重构，成为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必须面对的重要内容。其二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一些原本在中国文化传统覆盖之下的地区在经历了多年的被殖民统治以后发生了文化认同上的扭曲。台湾地区部分思想文化界人士对日本殖民时期念念不忘、香港地区对英国殖民时期的心态都是很典型案例。这些地区部分民众对中国大陆的社会和文化面貌产生了怀疑，甚至转而关注、认同西方价值观念。其三是中国以外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处于移民心态和本土心态的纠结之中。胡月霞指出“这些华侨远离本土，他们通过方言群文化维系中国本土文化，形成同心圆的重迭”，但是“土生华人则大多数不再像第一代华人那样，对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因而有更多的文化兼容和接纳多重文学传统的可能性”。（胡月霞，2005：55-60）新加坡学者骆明同意尤今的说法，即东南亚华人不再有中国人身份，但“在感情上、文化上、血缘上，仍跟中国有关系”。他提出以“片”而非同心圆的方式来谈世界华文文学结构：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是“纯中国的”一片，东南亚华文文学是具有自身风格、写法、思想、感情、时代背景的“切切实实是东南亚的”另一片，欧美澳纽的华文文学“在许多时候还是中国的延伸”。（曹安娜，2002：72-77）这样的表述看似与余光中的“众圆同心”论相似，也强调了华人、华文文学的根还在中国，但其实二者有着不同的路向。一方面骆明把大陆文学和台港澳文学视为一体，抹平了其中存在的巨大差异，与大陆学者陈辽五年前对华文文学作出的“社会主义文学”“资产阶级文学”之分截然不同。另一方面作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者，

他更强调东南亚华文文学自身特殊的文化处境与独立地位,即“切切实实是东南亚”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文化不再是“中心/边缘”的关系,而是“中心/中心”的平等关系。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以中国大陆、中华文化为中心的华文文学“同心圆”范式存在一定的解释乏力状态。随着20世纪下半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开始兴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要求在“中国文学”上取得话语权、解释权,因此出现前文所论及的对“中国(大陆)本位主义”“‘中国性’的文化霸权”的不满。游离在14亿中国人之外的学者们试图稀释、破除中国大陆在华语地区所拥有的文化领导权,而他们所提出的华语语系范式已招致众多批评,难以帮助他们获得理论或实践上的主导权。

华语语系范式的提出,与对中国大陆本位的“同心圆”范式的质疑是一体两面。毋庸讳言,华语语系范式本身就包含着反对中国大陆意识形态乃至歪曲、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意味。史书美提出的这一概念以其“狭隘的涵盖范围(排斥中国大陆)、去中国化的立场、非历史化的表现、中国/华语社群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吴景明、李忠阳,2019:86-91)招致了激烈的批评。依据史书美的观点,“华语语系研究是对处于中国和中国性边缘的各种华语文化和群体的研究”(史书美、赵娟,2011:5-14),将会导致“华语语系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被撕裂,成为没有价值的文字游戏,失去作为学术术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史书美看似持中、公平的论述,其实对中华文化有所曲解。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现当代社会,“中国”“中国人”“中国性”从来没有如她所言被化约为汉族文化,恰恰相反,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认为,中华文明是由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周恩来,1984:377)。“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我们的根本政策是要达到各民族的繁荣”(周恩来,1984:379)。在当代中国这样的认知一以贯之。身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深化的今天,回顾新中国在实现民族共生共进的种种努力之后,再审视史书美的“中国性”批判,就更能看出其在理论上的“虚空打靶”。

王德威对史书美的观点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他对华语语系范式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王德威主张应将中国大陆文学纳入华语语系文学的范围之内,对史书美偏激、片面的“去中国化”华文文学观作出了一定修正,不过这种修正又因为他将中国大陆文学“包括在外”的怪异表述而显得相当有限。王德威在建构华语语系范式时似乎有一种矛盾心态:不纳入中国大陆文学,所谓华语语系研究就只是一场空洞的玩笑;纳入中国大陆文学,其体量就必然居于绝对的中心。于是王德威以“包括在外”来扭捏地表达对大陆文学本位、对“同心圆”范式的怀疑。第二,王德威对华语语系范式的阐释突出了华语语系的所谓多元性,他认为华语语系的概念“意在说明中国大陆及海外不同华族地区,以汉语写作的文学所形成的繁复的脉络”。(王德威,2006:91-93)在他看来,通过“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可以打破中心/边缘、本土/海外、正统/延异、源/流、内/外之间不平等的空间想象与位置分配,使中国文学研究摆脱国族主义、同声一气的遮蔽,把海外文学、华侨文学的色彩呈现出来。第三,王德威把华语语系文学的边界继续向外打开,不仅将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全部归于华语语系文学之列,还将华人以其他语言创作的作品也纳入其中。他举中国哈金为例,说明“虽然他以英文创作,但是‘发声’的位置是中国的”,因此,他所建构的华语语系文学中的“语系”与语言学中的“语系”有所不同。

王德威对华语语系范式的构建在凸显海外学者视野、去中国(大陆)中心化等方面比较突出。他把华文文学理解为一种众声喧哗的状态,提醒中国学界将视线投射到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外,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史书美以来华语语系范式在理论建构上的缺陷。即使是经过王德威润色的华语语系范式,在挑战原有的、传统的“同心圆”范式时仍然要应对形形色色的问题,其回答问题时的难度比“同心圆”范式更大:中国大陆文学无论体量、读者群体、市场、社会影响都远超港澳台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而海外华人学者疾呼要尊重边缘文学的地位,甚至不惜为了边缘而忽视、矮化、否定本已存在的中心。一些学者希望通过华语语系范式来改写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们所理解的“合理”关系恰恰因为游离于中国文化精神之外、建立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片面理解之上而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他们以审视者的眼光来质疑中国对本国、本民族文学所应享有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刻意背离文学现实中的主次关系,把本应客观的立场隐晦地替换成其自身的主

观判断，是无法取得话语权上真正的公正的。在华语语系范式对多元性的强调上，王德威曾经总结李欧梵的观点：“强调边缘的、离心的、机动的中国性，和任何一个主权、区域、理念为中心的中国性作出区隔”（王德威，2014：5-20）。但是，如果中国性是“边缘的、离心的、机动的”，是难以确证自身存在的，这样一个毫无中心、恣意生长的反本质主义的中国性，如同没有中国性。

#### 四、当代语境下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选择

华语语系范式是否能够真正突破传统的华文文学研究的“同心圆”范式，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对台港澳文学来说，华语语系范式很容易与离心主义联系起来，史书美是台湾学界倾向离心声浪的学者之一。华语语系范式是她从文学研究上用于否定中国大陆本位“同心圆”范式的理论工具，这与杜正胜试图建立以台湾为中心的“同心圆史观”相呼应。王德威在《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一文中表示中国国内学界“有许多以民族/家主义为出发点的论述，虽然产生轰动效应，但是在议论和学术深度上都不足为训”，所举的例子中就包括中国大陆学者葛兆光对杜正胜试图重新定义“中国”的批判。杜宣称“把台湾地图横过来看，以此形成以台湾为中心的东亚同心圆关系”，这样台湾就成了同心圆的中心，“中国被看作是居于同心圆最外面、最扩散的那个部分”。（王德威，2014：5-20）这一目的在于“去中国化”、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属”认知方式的史观令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依据这一逻辑想象出来的“东亚同心圆”是否存在，无需赘言。杜正胜以台湾本位的“同心圆史观”反驳中国大陆本位的“同心圆史观”，林红指出他的逻辑主要通过三个路径展开：第一，凸显本土性和世界性，虚化中国性；第二，强调地方差异性，否定整体同一性；第三，假借文化多元性，消解政治一元性。（林红，2022：82-88）无独有偶，这样的逻辑在所谓华语语系范式中也可隐约可见。

即使在所谓华语语系范式中，台湾文学的地位也比较特殊。一方面，华语语系范式试图取消中国大陆文学的核心地位，就必然要抬高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位置。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就持续在“去中国化”的风潮中弱化汉语的地位。不但不断以所谓《语言平等法》和《语言发展法》来试图把“国语”拉下神坛，某些台湾政客、学者还提出“台湾是南岛语族原乡”之说，通过沈建德“台湾有2000万原住民后裔”等言论来背离中华文化，把台湾推向南岛语系民族，从而建构“台湾民族主义”，甚至出现“台湾属于南岛文化，与中华民族是不同血缘”的论调。某些学者对台湾文学地位的抬高与当下的社会氛围构成了生动的反讽，所谓华语语系范式也与台湾政客们热衷的南岛语族叙事形成对比。

在文学史中海外华文文学的自我定位比较微妙。尽管华语语系范式的倡导者们表现出对海外华文文学在华语语系文学中地位的关注，但海外华文文学具有双重身份：它们的作者不但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也需要成为所在国文化的接受者乃至倡导者。早在20年前，施建伟已提出文学观念更新和文化母题转型导致海外华文文学进入到“新华人文学”阶段。希望在异国他乡“赢得新生命的阳光”的新华人不甘于处在中西文化夹缝，他们一改对于乡愁、乡思、乡恋之文化记忆的书写，着力于创作在居住国“落地生根”、文化认同与融入的作品。（施建伟，2003：15-21）骆明则强调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在地化”书写发展出了自身的独立性，不能被简单视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华文文学扩大推广，争取华文文学能与各国的其他语文并列，更重要的是争取到国家语文的地位。”（曹安娜，2002：72-77）以上种种都显现出海外华文文学的处境，即与中国大陆文学和台港澳文学不同，海外华文作家实则在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受现实生活的影响，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很多华裔作家的精神世界中“退隐”。他们摆脱了社会封闭性和文化排他性的局限，勾勒所在国的文化与社会。与其说这些海外华文作家希望凸显自身作品在华语语系文学中的地位，不如说他们更愿意自己的作品能打入居住国的主流社会，成为该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真正能够坚持、必须坚持中文创作，能够产生深厚中华文化认同的，只有居于华文文学结构中心部位的中国大陆作家群体。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但它绝非孤立于大历史语境或背景之外。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主流趋势都与华文文学发展有所关联，关涉着不同国别、民族的文学氛围，也牵引着华文文学的走向。中国大陆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历史时期，“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指引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对自身的文化领导权——不仅是对华语世界的文化领导权，更是强化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充满信心。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经过数千年历史检验、走过新中

国 70 年艰辛实践的中国大陆文学界固然能够尊重、包容、欣赏在各种不同语境下生成的形形色色的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但以去中国（大陆）中心化为目标的华语语系范式来改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现实文学格局中实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仍有待进一步论证。无论从创作群体、作品数量、读者数量还是社会影响来看，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显然是华文文学场中当之无愧的主流。

当然，这不意味着“同心圆”范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华语语系范式就纯然无用。王德威表示华语语系文学的视角能够“在一个更广阔、开放和包容的格局里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王德威、王晓伟，2017：5-18），从而拓宽中国现代文学的视野。陈思和认为王德威的这种认识“有利于华语世界的交流和团结”（陈思和，2017：25-28），承认了华语语系范式合理性和启发性。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华文文学中的多元化观念首先是建立在中国当代经济、文化弱势基础上的。台湾文学在中国大陆比较疲敝的时期以现代主义为跳板，占据了华语文学副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华文文学补充，欧美华文文学对大陆文学的批判，都表现出各自的向性。东南亚华文文学由于在反殖民、反压迫上与中国大陆存在共识，表现出一定的亲中性。欧美华文文学则更倾向于西方价值观念，比如部分地延续了民国时期所谓的国民劣根性批判。可以把华文文学的不同板块理解为大圆、小圆的嵌套与交错结构，并非完全的同心圆。在今天，国力的增强直接促进了中国文化地位的提升、文化向心力的凝聚。在新大众文艺的推动下，中国的文坛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了新的、强劲的生命力。依据目前发展趋势，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才可能真正形成华文文学的同心圆结构和妥善处理华文文学中心和多元的调和问题。

## 五、结语

不管史书美、王德威等华语语系文学倡导者彼此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他们都存在这样的共同倾向：华语语系范式的核心与其说是承认多元，不如说是消解中心。具体言之，史书美的真正用意在于否认中华文化中孕育出的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强关联性，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语言工具，从而剥离汉语背后的历史积淀和价值认同，最终实现对传统的华文文学研究“同心圆”范式的逆反。

余光中说，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绝对多于以英文为母语的人口，“华文作家应该在世界文坛占主流地位”“华文文学是无数个同心圆，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核心”，他称华文作家的足迹是华文文学同心圆上大大小小的圆点，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以中文来延续同心圆的半径。（曹安娜，2002：72-77）以中文进行思考与写作、融入中华文明传承下来的种种元素，中国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同一性由此得以生长。但同一性之外也存在差异性，如骆明所说，这种飘浮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与所在国发生多元、多重关系的华文文学中心实际上更倾向于向居住国主流社会靠拢。如何对华文文学所涉及的同时性和差异性进行调和，是需要华文文学研究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断探索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曹安娜. (2002). 东南亚华文文学透视——余光中、骆明、庄钟庆访谈.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4), 72 - 77.
- 陈辽. (1997). 论香港回归后中国和世界华文文学格局的新变. 学海，(5), 103 - 105.
- 陈思和. (2017). 读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南方文坛，(5), 25 - 28.
- 樊洛平. (1998). 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趋势——关于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思索.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117 - 121.
- 胡月霞. (2005).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移民心态与本土心态.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55 - 60.
- 林红. (2022). 杜正胜“同心圆史观”为“台独”张目. 历史评论，(1), 82 - 88.
- 刘登翰. (2001). 分流与整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 文学评论，(4), 42 - 47.

- 施建伟 . (2003). “从边缘走向主流”——海外华人文学的现状和将来 . 华文文学 , (1), 15 - 21.
- 史书美 . (2013). 视觉与认同: 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 · 呈现 .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 史书美 & 赵娟 . (2011). 反离散: 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 . 华文文学 , (6), 5 - 14.
- 王德威 . (2006). 中文写作的越界与回归——谈华语语系文学 . 上海文学 , (9), 91 - 93.
- 王德威 . (2014). 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 十个关键词 . 华文文学 , (3), 5 - 20.
- 王德威 & 王晓伟 . (2017). “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 南方文坛 , (5), 5 - 18.
- 吴景明 & 李忠阳 . (2019). 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史: 从民族国家范式到华语语系范式 . 文艺争鸣 , (2), 86 - 91.
- 周恩来 . (1984).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 人民出版社 .

### 作者简介

岑园园, 在读博士, 广州理工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台港澳文学与文化, 外国文学。

### 致谢

本文系广州理工学院优质课程“海外华文文学”(项目编号 2024XYZK19) 阶段性成果、广州理工学院 2024 年校本项目“《海外华文文学》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2024XB070) 阶段性成果。